

中国修辞

ZHONGGUO XIUCI

2014

胡范铸 主编
林华东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ZHONGGUO XIUCI

中国修辞

2014



胡范铸
林华东 主编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修辞. 2014 / 胡范铸, 林华东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486-0965-0

I. ①中… II. ①胡… ②林… III. ①修辞学—文集
IV. ①H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9931 号

中国修辞 2014



主 编—— 胡范铸 林华东

特约编辑—— 张虹倩

责任编辑—— 吴耀根

封面设计—— 周剑锋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印——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6 万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965-0/H·59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附件3《资助国中》

（征求意见稿）

本卷承泉州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中国修辞》发刊词

陈光磊

中国修辞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个年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举办过大小规模的学术活动数百场,与此同时,中国修辞学会编辑的《修辞学论文集》亦延续着每届年会出版一辑的传统。

当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正迈入了一个新纪元。社会语言生活的飞速发展与深刻变化呼唤着中国修辞学有更多、更强有力的话语介入。而就修辞学科自身而言,亦亟需在学术空间的广度与深度上有进一步的拓展,从而为社会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持。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因应时代与学科自身的发展要求;如何才能有效地“以修辞学为工具,促进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个人与个人语言交往的现代化,促进个体的社会化,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成为摆在当代中国修辞学人面前的重要议题。

我们以为,一方面既要对修辞学科做出更为深入的探究,以提高其对现实语言生活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需搭建更趋宽广的学术平台与阵地,促进学术共同体彼此间的互动对话,以推动修辞学科较快而又稳健的发展。

鉴此,在各方同仁的支持下,我们筹备出版了《中国修辞》。《中国修辞》属丛刊性质,每年出版一卷,旨在总结反馈中国修辞学在过去一年里的发展态势,展现前沿理论研究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学科的未来走向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关于《中国修辞》的选文,主要源于以下四类:

- (1) 当年已发表的重要论文的选登;
- (2) 当年中国修辞学会主办的会议论文选编;
- (3) 当年度中国修辞学会会议综述;
- (4) 当年度修辞学相关博士论文摘要。

此四类的选录主要基于典型性、影响性、全面性等原则,通过以点带面,由中心辐射周边的方式,以求尽量做到客观呈现学科发展的态势。

当下,中国社会语言生活正不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也正不断建构着修辞学的发展空间和学科生态。北宋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见《正蒙·乾称》)。此“横渠四句”既彰显了儒者自身的器识与宏愿,亦承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社会担当。那么,作为当代中国的修辞学人,不仅要致力于修辞学研究技术与工具性范畴的大幅创新,更要肩负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由提升当代社会语言生活质量出发,不断发现探索新问题,设计演绎新方法,最终回归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由此,我们希望,并且我们相信,《中国修辞》丛刊的问世将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修辞学科自身的有效发展,同时促使其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如此,逐步将中国修辞学建设成为一门在观念、理论与方法上都呈现空前想象力的学科,一门同当代生活紧密相依、彼此建构推进的“显学”。

《中国修辞》编委会

(以下名单皆按音序排列)

编委会顾问

- 柴春华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程祥徽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教授
黎运汉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暨南大学教授
李熙宗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复旦大学教授
刘焕辉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南昌大学教授
陆俭明 《当代修辞学》顾问、北京大学教授
屈承熙 《当代修辞学》顾问、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沈家煊 《当代修辞学》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田小琳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张 静 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河南大学教授
郑远汉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华中师大教授
宗廷虎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复旦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 陈光磊 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胡范铸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教授

编委会副主任

- 冯广艺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刘大为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亚猛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谭学纯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建华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浙江科技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曾毅平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先亮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祝克懿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修辞学》主编

编辑委员

- 曹石珠 湘南学院原校长、教授
陈光磊 复旦大学教授

陈佳璇 韩山师范学院国际汉语教育系主任、教授
池昌海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杜 敏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授
冯学锋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教授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
林华东 泉州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
刘大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亚猛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马清华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曲卫国 复旦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
束定芳 《外国语》主编、教授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毅平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国军 《当代修辞学》编辑部主任
祝克懿 《当代修辞学》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 卷 主 编 胡范铸 林华东

编辑部主任 张虹倩

编辑部邮箱: zhongguoxiuci@sina.com

目 录

《中国修辞》发刊词	陈光磊 / 1
-----------------	---------

本 卷 特 稿

论语体与语体变量	刘大为 / 1
----------------	---------

中国修辞学年度论文选

“案例库修辞学”：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一种进路

——兼论“面向中亚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库”设计的基本思路

.....	胡范铸 胡炯梅 樊小玲 / 21
-------	------------------

融入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思

——基于广义修辞观的学术逻辑和学术实践

谭学纯 / 29	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	刘亚猛 / 43
----------	--------------------	----------

从库恩的学科范式到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范式

——文本解读范式的新思考

祝克懿 / 49	当代修辞学研究的拓展与固守	杜 敏 白 鸽 / 61
----------	---------------------	--------------

中国修辞学会年会论文选

政府微博语篇特征分析	崔蓬克 / 67
------------------	----------

危机管理、危机公关、危机传播之辨析

——一种符号社会学的考察视角

甘荏豪 / 84	塔吉克斯坦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刘伟乾 / 92
----------	------------------------	----------

“超语篇”结构

——西方新媒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新路径

一位修辞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基于《修辞学发凡》现代白话语例的考察

张虹倩 / 106	话语召唤结构的认知修辞研究	李勇忠 / 116
-----------	---------------------	-----------

语篇意义结构的稳定性

——从罗兰·巴特的文本类型理论说起

殷祯岑 / 121	试评《语言学名词》“修辞学”部分	李国南 / 127
-----------	------------------------	-----------

孙汝建 / 133	社会心理修辞学刍议	
-----------	-----------------	--

肯尼思·伯克的辞格认同观探研

——层递格的认同功能考察	袁 影/ 139
中国语言学科如何处于领先地位	林华东/ 145
中华传统语言文化在国际话语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柴俊星 柴春华/ 151
修辞学视角中的语块	
——以新兴“被 X”、“貌似”和“(V 的)不是 A,是 B”为例	赵国军/ 167
从“让××飞”看新媒体流行语的隐喻与模因	米幼萍/ 174
引用辞格审美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因	宗廷虎 李金苓/ 179
从张弓先生的“修辞与语言因素关系论”说到修辞研究的“本位观”	冯广艺/ 185
修辞与“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	曹石珠/ 190
论辞格的表层研究和深层研究	郑荣馨/ 198
别解及其文化特征	董 仁 于晓燕/ 202
《祖父的园子》改笔修辞分析	傅惠钧/ 205

重要学术活动述评

中国话语·社会发展：当代修辞学发展的新面向

——中国修辞学会 2014 年学术研讨会述评	陈燕玲/ 213
“大众语”讨论的意义与修辞学研究的进展	
——纪念“大众语”讨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	
望道修辞学论坛综述	陈志芳 王 志/ 216
国家形象修辞：网络时代的“说”与“听”	
——第四届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樊小玲 张虹倩/ 218

全国修辞学博士论文文摘选

空间的制约与语言的表达

——基于汉语报刊新闻标题的考察	白丽娜/ 221
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	韩晓晔/ 222
合意性原则与刑事庭审转述行为分析	吕晶晶/ 223
意向性作用下的语篇组构研究	仇立颖/ 225
文本关键词的语篇功能研究	宋姝锦/ 227
言语行为视角下的政府微博语言研究	崔蓬克/ 228
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辞格系统研究	李 颖/ 230
现代西方修辞视角下的钱钟书	秦亚勋/ 230

论语体与语体变量*

刘大为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提要 本文以言语活动为依托探讨对语体的本体认识, 以及以语体变量为核心的语体研究方法。论文首先以言语活动作为研究的初始概念, 论证了语体的性质和本体构成并对语体进行了界定。然后从语体的本体构成出发, 提出语体研究的方法主体应该是解释, 由于语体是一种复杂现象, 解释的相关性问题就应落在“分解-整合”的可能性上, 从而铺垫了提出语体变量概念的必要性。论文认为传统的语体研究因为将语体的形成归因于使用域而不是使用, 导致研究遭遇了瓶颈, 而语体语法的新进展则在语体与言语活动的联系以及特征分解的研究方法上提供了启示。在此基础上论文集中讨论了“分解-整合”所带来的语体变量的问题, 从变量的提取、语体变量与子变量、变量的组配与语体的类型、语体变量与使用域等方面, 明确了如何运作语体变量是语体研究在方法上的集中体现。最后从语体变量出发, 提出了语体研究的四种范式: 解释范式、推绎范式、本体范式和语篇范式, 对前两种范式还提供了个案分析。

关键词 语体 言语活动 语体变量 子变量 使用域 语体研究的范式

语体研究渐渐走热, 也使它在基础理论上的薄弱日益清晰地暴露出来。曾经得心应手的方法需要重新思考, 焦灼期盼中的理论外援又似乎无处可寻。为了进行语体研究必须首先进行如何进行语体研究的研究。

本文不揣简陋对此提出一些设想。我们的基本观点是, 语体理论需要优先解决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基本问题: 作为学科对象的语体只能依托使用中的言语活动来考察, 而不能像传统研究那样依托使用域来确定; 语体研究不同于一般语言学研究之处在于它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现象, 必须有一种方法对之进行分解和整合, 我们对这种方法的探究就集中体现在语体变量这一概念之中。

一、从语体的本体构成到解释作为语体研究的基本方法

1. 言语活动是语体研究的初始概念

尽管对什么是语体学界还在争论纷纭, 也

尽管使用者远不能说清他心目中的语体是什么,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人们按照语体的规范去使用语言, 我们所遇到的绝大多数语篇都是合“体”的是不争的语言现实。这说明语体和语法一样, 已经作为一种语言能力, 一种语言的知识体系, 一种具有心理实体的语言机制潜在在每一个使用者的心理中, 显露在他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体研究不应脱离这一现实去孤

* 本文部分内容曾分别以《修辞学视野中的语体理论重构》、《现场语体的变量分析与语言特征》、《语体的重新认识与语体研究的四种范式》、《从使用域到语体变量: 语体研究的方法与范式》、《走出语体研究的瓶颈》为名在汉语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2012年4月, 香港中文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预备会议(2012年4月, 复旦大学)、交叉视野中的语体研究学术讨论会(2012年7月, 复旦大学)、第四届望道修辞学论坛暨第八届语体风格学学术研讨会(2012年12月, 复旦大学)上宣读, 得到与会学者的不少宝贵意见和热情鼓励, 特别是陶红印、冯胜利、张伯江诸先生的指点, 在此谨致谢忱! 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综合上述五次报告的内容并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立地考察语体,它的全部程序都应该围绕着如何切近这一心理存在和使用过程而展开。

1.1 从言语活动到语体的“体”

如何才能切近语言使用者心理中和使用中的那个语体?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如下几个侧面恐怕都是无法绕开的。

I 只要感受到了某种语体的制约,我们就一定是在施行某种类型的言语活动^①。

例如是在进行叙事的言语活动、非正式的言语活动、凭借书写而得以实施的言语活动,或者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看,是学术演讲的言语活动、签订合同的言语活动、写微博的言语活动、进行现场新闻报道的言语活动等。没有哪一种语体能够不依托一种类型的言语活动而单独存在,研究语体就必定要将语言事实放在一种实际发生的言语活动中加以认识。

II 任一类型的言语活动得以施行,都会对行为者的行为方式提出系统的要求。

行为方式多种多样,诸如上述的叙事、报道、有准备、非正式、书写、运用网络等,它们都可以从功能意图、人际关系、传介方式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次言语活动的完成会要求多种行为方式的共同参与,哪怕是教师讲了一次课,就至少实现了讲解、现场、非对等交互、一对多交互、正式、口说等多种行为方式。所以任何言语活动分析下来,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行为方式;而言语活动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类型,也因为参与其中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本文第三节将论证正是这些行为方式作为语体变量构成了语体。

III 某一言语活动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实施下来,必然会导致语言在使用方式及语言形式上的成格局的变异。

言语活动中各种行为方式的形成,都源于语言外人类生活的不同要求,而它们的实施则必须通过语言的操作。行为方式的不同也就是操作语言方式的不同,它可以是使用方式上的改变:虚构与纪实就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语言形式,也会造成语言形式的变化:现场和叙事的行为方式要同时得到满足,句子

中就必然会出现动词的现在进行时;要对操作进行指导,受事就会得到彰显而形成中性语态(陶红印 2007)。

这些变异都是围绕某一类型言语活动的有效施行而发生的,是这一言语活动所要求的种种行为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彼此之间就必定会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的格局。这种格局,正体现了语体的“体”的含义。

IV 具有语体价值的、成格局的语言变异一定出现在一次言语活动所赖以发生的语篇构成中。

语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言语活动,就在于它对于语篇构成的依赖。我们注意到一般对话体的认识中都将语体描述成一种语言运用特征的“综合体”(刘辰诞等 2011、黎运汉等 2009)或是“体系”(袁晖等 2005),更普遍的说法认为语体就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这些表述暗含着的意思就是——语体的这些特征不过是资源性的,可以在一定的使用领域内按照表达的需要自由地选择和运用,就如我们在语言的体系内进行选择一样。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与“体”的意义相冲突的:所谓“体”,就是格局,就是模式、体式,按照“体”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就意味着这一格局或模式、体式一定会在这一次使用所造成的语篇中再现,否则该语篇就无法顺利实现相应语体的功能要求。所以格局中的语言特征出现在使用过程中必定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强制性,而不单单是资源性的。语体不是一张有待选择的清单,它已经是语篇选择的结果。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只有在实施一个完整的言语活动的过程中,而不是仅在孤立的功能动因的推动下,语言的各种变异才有可能因为这一言语活动的统合要求而彼此依赖、相互配合成为一个格局,一个“体”。没有言语活动而只有不同使用环境(使用域)的需要,我们只能观察到个别、零散的语言变异而无从发现这个“体”(见本文第二节)。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着眼,言语活动都是研究语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初始概念。

1.2 语体与语体能力

1) 初步的定义

以上四个方面如果确是考察任何一种语体时都无法避免的,我们就可以给语体下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义:

语体就是一种类型的言语活动得以实施而必须满足的、对实施者行为方式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在得到满足的过程中所造成的、语言在使用方式或语言形式上成格局的变异在语篇构成中的表现。

这一定义得以成立,就在于言语活动为语体准备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个是言语活动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层面,一个是言语活动得以完成必须进行的语言变异的的操作层面。由于前者正是后者所要实现的功能,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层面分别称为功能动因层和语言变异层。

2) 语体能力:在语体的功能动因层和语言变异层之间

通常对言语活动的理解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被视为功能动因的行为方式而不在意它所造成的语言变异;而对语体的概念,则如前所述都重在语言在使用中形成的特征而不将它们所应对的功能动因视为语体的一部分。一个重在功能动因,一个重在语言变异,言语活动与语体两个概念的差异似乎正在于此。

然而一旦将语体也视为语言能力的一部分,认为语体也有其心理实体的存在,就会发现仅将语体定义为言语特征的综合体或体系是难以成立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只是凭借一份份罗列着众多而琐屑的言语特征的清单,使用者就能认识不同的语体并在记忆中储存、在使用中区分吗?显然这样的掌握方式将使他的心智承担不堪重负的压力。合乎认知规律的语体存在方式应该是以简驭繁的、从理解到记忆的,显然以人们易于认识和把握的言语活动类型(也就是它们所要求的行为方式的组合),来控制种种不同的语言变异形式,后者就更容易理解、记忆和提取。顺理成章的设想应该是,人们是对言语活动的行为要求和相应

的语言变异同时加以认识,并在前者对后者的解释中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进入记忆的,它们因而都是语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以上的观点还是不能解释这样一些现象:人们经常不是在已经熟练掌握了一种语体类型后才进入相关语体的言语交往的,更多的情况下倒是从某言语活动对行为方式的要求出发,根据语言的通则和生活的经验进行推理而获知必须在怎样的变异情况下使用语言,尤其当一些新的语体类型在适应交际需要临时发生时更是如此,因为此时完全没有既成的语体知识可供参照。如此看来,在语体的本体构成中,功能动因层也即言语活动对行为方式的要求甚至有着比它所导致的语言变异更为重要的价值。

一旦采取这一认识,就必须同时看到语体的这两个层面之间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人的语体能力,它指的是我们一般性的语言能力中还包含着从言语活动的功能要求推知应该如何变异使用语言的能力。有了它,语体的两个层面才可能联系起来,语体才有可能不是作为一种静态的、封闭的既成事实,而是作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生成过程被研究。看来语体研究更应重视这种能力,关注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又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培育、强化、发展人们的这种能力。这很可能要比完备周密地划分语体的类型体系、细致入微地列举每种语体的言语特征有更高的学科价值与应用价值。

1.3 语体的本体构成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我们的定义如果确实描述了语言使用者心理中的那个“语体”的话,便可以由此做出关于语体的本体存在和语体研究方法的两个假设:

I 语体很可能不像传统研究所认定的那样,是一个语言运用中形成的特征组成的单层体系,而是一个由特定类型的言语活动对行为方式的要求(功能动因层),以及这些要求在实现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成格局的语体变异(语言变异层),二者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双层结

构体。

在确定语体类型时,毫无疑问功能动因层的作用远大于语言变异层;而在描写一个语体时,我们的注意力必定又要集中在语言变异层上。

Ⅱ 既然语体是这样一个双层结构体,对它的研究就不可能只是关注其中一个层面,而必然会将目标放在这两个层面之间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上。对这种关系的寻求,就是在进行解释,语体研究最合适的研究方法一定是解释的方法。

而解释的实质,就是在说明人的语体能力是如何在语体的两个层面间活动的。

2. 语体研究的方法:复杂现象的解释相关性

解释的方法当然不为语体研究独自钟情,它是语言学也是所有强调科学性的学科^②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规范—描写”阶段之后的必然走向。但是语体研究显然对这一方法有特殊的依赖,离开了解释的关系语体的研究便毫无价值可言。

2.1 语体研究需要的解释是功能解释

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指出解释的方法有四种类型:演绎性解释、或然性解释、功能性解释(或称目的论解释)、发生学解释(内格尔 2002)。形式主义语言学,例如乔姆斯基的语法研究运用的正是演绎性的解释,而语体研究所需要的却是功能性的解释。它可以理解为“现阶段的一个行为来自于行为者在现时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便是希望在将来达到某个目的”(波赛尔 2002),即:

现阶段—状态 1—状态 2—状态 3——将来之目的(波赛尔 2002)

这就是说,所要解释的现象处在如此状态中是我们的行为造成的,而我们为何采取如此行为,是因为这些状态一旦出现便具备一定的功能以实现我们的某种目的,因而对这些状态的解释就要到它所实现的功能与我们目的的一致性中去寻找。

演绎性解释需要的是逻辑推理的三段论,

而功能性解释则有自己的行动三段论(波赛尔 2002):

A 想达到目的 Z

A 只有采取行动 X,才能达到目的

A 必须采取行动 X(或者 A 采取了行动 X)

语体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利用这个三段论(见本文第四节),一个是解释的方向:从“A 采取了行动 X”(而导致出现了某些语言变异)开始,解释就是指出行动 X 之所以会被引发,是因为 X 造成的变异能够使某一言语活动所要求的目的 Z 得到实现;另一个是推绎的方向,将 Z 作为变异的功能动因,从它出发推断一定会引发怎样的行动 X 导致怎样的语言变异发生。广义地说推绎也是解释的一种类型。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运用什么方法研究语体,只要承认语体涉及到功能动因和语言变异两个层面,研究时就不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功能解释的方法。可以说语体学就是解释之学,解释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语体研究的成败。

2.2 解释的相关性:从单一的相关性到复杂的相关性

解释其实就是寻求事实赖以发生的相关理由。由于语体研究的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作如下区分。

1) 简单的相关性与语言中单一的功能动因

运用解释性的方法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是:导致语体变异发生的功能动因并非孤零零地悬置在那里等待着我们,而是与其他许多类似的现象交杂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对需要解释的语言事实来说,究竟哪一种现象才是它的功能动因可以用于解释就成了一个问题。

对学术研究中经常会发生的这样一种现象,以科学方法论研究著称的学者亨普尔认为,“科学解释必须满足两个系统的要求,即解释的相关性要求(the requirement of

explanatory relevance) 和可检验性要求 (the requirement of testability)” (转引自陈嘉明等 2010: 38, 又见亨佩尔 1986: 53)。对前者, “是指解释所引证的解释性知识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使人们相信被解释的现象确实会发生或者真的已经发生。它排除的是将与被解释对象不相关的‘原因’作为解释根据来说明被解释现象的发生。” (陈嘉明等 2010: 38) 解释的相关性要求所表明的原则其实非常直观、简单, 那就是——

在看似有众多原因同时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情况下, 必须排除其中无关的因素而抓住直接导致结果的原因。

不过亨普尔着眼的只是不断“排除”, 排除后剩下的就是相关性原因, 而没有关注当多种相关性原因纠缠一起共同作用成为一个难解难分的混沌整体时该如何处理。这源于亨普尔面对的都是一种经过提纯的科学事实, 解释它只需要一种相关性原因便足以胜任, 例如他举出的例证是只需一条光学定律就足以解释自然界虹的形成。为此我们姑且将他的相关性称为简单的相关性。

同样对一般的功能语言学例如功能语法的研究来说, 亨普尔的相关性或许已经够用, 因为就学科宗旨而言它所关注的都是已经提纯也即撇清了语言运用中复杂联系的语法事实, 它们可以只在单一的功能动因中获得解释。例如研究汉语把字句的处置义, 以主观性为动因便足以进行解释 (沈家煊 2002), 而研究主语、宾语、旁语的语法等级, 有了认知心理中的显著度, 解释也就可以很充分地展开了 (沈家煊 1996)。在这样的研究中, 越是能用尽量少的动因去解释尽量多的语法事实, 学术研究的价值就越高。

2) 复杂的相关性与语体变量

从上世纪的上半叶开始, 科学界发生了一次探索复杂性的历史性转变 (普利高津等 1987, 严泽贤等 1993), 而复杂就意味着被解释现象是纠缠为一体的多种相关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何找出这些相关性, 以及它们又是

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就成了一个问题。

语体研究当然也属于功能语言学的范畴, 但是它关注的语言事实并非单独存在, 而是必定依托在一种类型的言语活动中, 语体的研究者要时刻提醒自己所关注的语言事实是这一活动的结果, 对它的研究才有学科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尽管任何研究都需要理想化的提纯, 可是对语体事实的提纯程度却不可能像语法事实那样高, 它们必定如前所述是一个格局中的要素, 受到格局中其他要素不可避免的牵掣和影响; 另一方面, 一种类型的言语活动必定是在对多种行为方式都有要求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 其中每一种行为方式都作为一种功能动因对语体事实的发生负有责任, 解释时就不能不一并加以考虑。这些正是语体作为一种复杂动因在解释时不同于一般的语法研究之处。

可问题在于, 研究之初这些动因并非自我分解为一个明确的要素, 而是相互渗透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同时在起作用, 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浑然整体的言语活动; 这些动因也并非孤立地各自导致结果的某一部分, 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合力。为了找到功能动因与语言变异在语体中究竟是如何“相关”的, 看来还有必要在亨普尔相关性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在复杂现象中寻找解释的相关性, 起码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方法, 将可能成为解释根据的多种动因从原先浑然一体的存在状态中分解出来, 确认哪些才是对于结果的相关因素, 它们各自要对结果负有怎样的责任, 又是如何整合在一起最后导致结果的形成。

可以将这一要求称为复杂的相关性要求, 简言之就是要对复杂现象进行“分解-整合”以找到相关性究竟何在。所以同是复杂现象的语体要得到解释性的研究, 首先就需要对语体的功能动因层进行分解和整合, 才有可能由此观察并解释语言变异层中的种种事实。分解的结果就是第三节将要探讨的语体变量, 而语

体变量的整合不仅使得语体的种种变异得到解释,同时也使得语体能够作为一个分解过的整体,而不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

二、语体研究在哪里遭遇到了瓶颈?

1. 语体形成,依托语言的使用还是语言的使用域?

语体研究是修辞学的学科支柱之一,但是客观而论,在当代学术理念的嬗变跃迁中它的发展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究竟是在那一道环节上出了问题?我们已经论证,语体形成的依托是语言的使用——言语活动;而在传统的研究那里,语体的形成却被依托于语言的使用域。很可能就是使用域和使用的对立,使得传统的语体研究和当下研究者的关注南辕北辙。

1.1 从使用域出发的语体界说和分类

建立语体的概念,为的是说明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可是认识语体,却在语言的使用之外似乎还有一条更为直观、便捷的路径可走,那就是从语言是在何种环境,也即语言的何种使用域中被使用的来观察语体。语言的使用形成了什么类型,需要一定的事实概括、学理分析以及思维抽象才能认识到,而语言的使用域却早已现成地放在那里,仅凭我们的常识就可以轻松地分辨出来。这样从语言使用域出发来认识语体并给语体分类,就成了苏俄以及西方的一些语体研究中习以为常的做法,我国的语体研究也深受影响。

已经深入人心的理念是语体与语言的使用域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语体就是“与交际领域相对应”的“言语表达形式的特征体系”(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2012),语体作为一种“语言表达体系”是“适应某一交际领域和交际内容的”(邢福义等主编《现代汉语》2003)。由此来盘点多年来学者们界说语体并进行语体分类的原则,尽管实际着眼各有所异,却毫无例外地都可归入对使用域的依托,例如“交际功能或外部因素或语境”(黎运汉等

2009),语言使用的“不同场合”(程雨民《英语语体学》1989),“典型的社会活动情景”、“社会活动领域”、“交际领域(即社会性情境)”(张会森《修辞学通论》2002),“人类言语活动的语境类型”(王德春等《语体学》2000),“类型化的交际领域”(袁晖等《汉语语体概论》2005),“语言使用的领域”(王德春等《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1986),“不同”的“交际的环境”(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1997),“说话时的情景,包括说话的内容、对象、场合以及说话的目的和动机等因素”(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不同的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方式”(刘辰诞等《什么是篇章语言学》2011)等等。而所谓的功能变体或者分类的功能原则中的“功能”,其实指的都是语言可“服务”于怎样的“交际领域”。一句话,可以从语言使用域的分类来认识、划分语体的类。

由于使用域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采用以上的原则分出的类一定是大同小异的,不外乎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法律语体、文艺语体、广告语体等等。它们影响深广,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实。为了与使用域分类的理念保持一致,有一些原本可以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认识的类别,例如谈话语体、公文语体等也被赋予了一个“域”,成了“日常会话交际领域”(黎运汉等 2012)、“公文事务交际领域”(袁晖等主编 2005)。

从使用域出发进行分类的优点在于,得出的语体很容易与人们的常识保持一致,也就很容易被不假思索地理解和接受,成了长期以来语体分类的主要方法。然而学理与常识毕竟并不经常是一致的,稍加分析,便可发现使用域与语体是两个完全无法对应起来的概念。

1.2 使用域:划分出的不是语体的类,描写的也不是语体类的特征

1) 使用域只有通过言语活动才能影响到语言

固然语言各种各样的使用域——无论法律还是文艺,教育还是医务领域,为了自身的运作都会对语言的使用提出不同的功能要求,

并且只有在它们实现为相应的语体变异后,领域的运作才有可能成功。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

使用域的功能要求作为原始动因不可能直接引发语言的语体变异,二者之间必定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人对语言的使用,也就是不同类型的言语活动。使用域对语言的原始动因只有转化为言语活动的实际动因,才能作用于语言而引起相应的变异。

无论哪一种使用域都是一个复杂系统,都对语言的使用提出了纷繁庞杂的功能要求,而另一方面无论哪一种言语活动都有自身的独立性,都会受制于自身特定的结构而在功能上有所选择。两相适应,只能是言语活动以自身的结构制约对来自使用域的功能要求进行筛选、梳理和组织,它们才有可能转化为言语活动的功能动因而不再是使用域原始的要求,推动语体变异的发生并形成一个语体的格局。

2) 一种语体可适用不同的使用域,一个使用域须由多种语体来满足

毋庸置疑的是,不存在一种类型的言语活动能够实现某一使用域所有的功能要求——例如科技使用域的全部功能要求若得到实现,就必须借助讨论、演说、讲课、写作论文、撰写实验报告、制定科研计划以至指导研究生等多种类型的言语活动,也就不可能存在与某一使用域完全对应起来的语体,它必须由不同语体的配合才能得到满足。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一种语体也必定会被多种使用域运用,无法想象不同的使用域之间在语言的运用上会没有共性。由此看来所有通过使用域标准得出的语体类型都是无法设想它们在现实中的存在的,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个被称为科技语体或是新闻语体的东西。

3) 使用域视野中只有语体变异的无序杂陈

能否暂且跳过言语活动,直接从一个使用域的全部原始动因出发去追索最终的语言变异,从而对这一使用域语体的语言特征做出全面的描写呢?传统的语体研究其实正是如此

操作的。然而这种做法只是在试图列举一个庞大的使用域中可能发生的全部语言变异,而不是在对某一语体进行描写。这些特征只能被简单地堆积在一起,却不可能赋予它们以一个语体必须具备的格局关系。离开了言语活动的筛选、梳理和整合,使用域的原始动因不会按照语体的需要自动重构,当然也无法致使语言发生成格局的语体变异。

结论是,使用域与语体之间并无直接对应的关系,否则有了科技语体、新闻语体,为什么不能有经贸语体、外交语体,不能有教学语体、医务语体以至于宗教语体呢?从使用域出发无异于缘木求鱼,划分出的不是语体的类,描写的也不是语体类的特征。不过使用域并非对语体研究没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表现在语体形成之后而不是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详见第三节的第5小节)。

2. 语体研究在此止步不前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用法律语体、科技语体之类来泛称相应使用域中的常用语体类型未尝不可,但是将它们用作严格意义上的术语来做语言学上的烛隐钩沉,却必定会阻止我们对语体的洞察。

2.1 罗列,而不是语体研究所需要的格局

从使用域划分出来的语体其实就是使用域本身。离开言语活动的梳理和整合而使研究者直接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混沌整体,能够从中观察到的就只能是一群简单罗列着的现象。例如科技语体就被描写为——

(1) a. 广泛运用科学术语,适当兼用古语、外来词,而不用方言、土语和表情性、描绘性的词语

b. 句法完整:多数是陈述句;多用联合短语充当各种句子成分,多用逻辑限制语、插入语和关联词语;句子较长,复句和多重复句用的频率很高。

c. 多用公式、符号和图表

d. 语言平实、朴素、简练

e. 语篇富有逻辑性^③

这些被平列出来的特征间实际的语体价值是有极大差异的。例如“多数是陈述句”，由于陈述是人类言语活动中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大多数语体在实施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多数是陈述句”的特征，它对于科技域中大多数的语言运用来说语体价值就会几乎为零。可是到了同为科技语体的指导语体中，祈使句的比例却会大大提高，“多数是陈述句”还能否成立就需要重新考虑。同样“语篇富有逻辑性”、“句子较长，复句和多重复句用的频率很高”也是所有论证语体的特征，不唯科技域中的论证所独有。可是在科技域使用的辩论体中，句子的长度和复杂程度就会降低，语篇结构的逻辑完整性也无法与书面论证相比。

语体价值不同的特征为什么在这里会被等量齐观地罗列在一起？原因就在于它们其实是研究者观察科技使用域中的常见语篇所得出的印象，这些语篇是分属于不同语体的，可是使用域的原则却要求研究者将这些印象都归于科技这个“域”。前已指出，我们是找不到一种言语活动能与这个“域”对应起来的，于是在归于这个“域”的过程中，也就没有一种原则能立足于这些特征之间可能有的依赖关系进行取舍和整理以形成一个格局。唯一能采取的方法，就是将所观察到的常见特征都平行地列举出来。

2.2 经验事实，而不是语体研究所需要的学科事实

尽管都是语言事实，已经成为学科对象的事实与停留在经验感受中的事实是大不相同的。对语体研究来说，作为学科事实的语言特征一定负载着特定语体的信息，从语言特征的概括程度和描写方式就可以分析出它所能实现的语体功能。关键就在于，只有在语体所依托的言语活动的运作过程中，这样的特征才有可能形成并显示出来；也只有时刻惦念着一种言语活动所要实现的功能，研究者才有可能形成对相应特征的敏感性，获得对之进行概括、分析和描写的依据。离开了特定言语活动的制约，研究者在漫无边际的使用域中所能遇到

的就只是一些不对特定语体负责的、表面化的特征。它们不仅为同一使用域内的许多语体，也为跨域的许多语体所共有。例如：

(2) 新闻语体：句子短小单纯 段落短小
运用普通话，少用方言土语 选用普通、常用的词语组织成句 大量运用新词语 直接借用外来词

新闻语体内的通讯体：多用感情性、描绘性词语 句式灵活多变 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多种修辞格的综合运用
显然这样的语言特征对展示一种语体的面貌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适应一个使用域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的语体，我们就只能降低对语言事实观察的学理层次，以至于降低到适应面最广的常识经验，不经学理的分析人们也能在语言的实践中获得这些经验的感受，然后用常识的语言描述出来。例如：

(3) 文艺语体：大量使用形象化的词语 锤炼动词来刻画事物的动态 精选颜色词，表现事物的色彩形象 大量使用俗语、口语词 词性灵活多变，改变词语本身词性和句法功能 语序灵活自由，改变句法成分常规的位置 句子结构繁简灵活

谈话语体：非主谓句的大量使用 单句多，复句少 句子结构简单 大量借用非语言手段表情达意

广告语体：运用押韵、谐音、叠音 使用常用词语 创造新词 大量使用成语、俗语 大量使用第二人称代词 大量运用非主谓句、省略句 多用简单句，少用复杂长句 常用并列结构、兼语句、祈使句
或者在主观感受的层面上再对这些经验感受做一些概括，例如：

(4) 文艺语体：形象性 情感性 生动性 美感性 变异性

文艺语体内的脚本体：口语化 个性化 动作化

至于直接用“直截了当、言明意显、内容新鲜、形式新颖、简洁精要、通俗平实、优美悦耳、深